

双循环视域下的三驾马车发展方向

■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院长

摘要:需求侧改革的提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方针一脉相承,体现进一步着力于打通经济循环中需求潜力释放的堵点、优化全局统筹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思维。本文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分析新形势、新时期需求侧改革的背景和内涵,探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在双循环视域下的发展方向,在统筹协调大思路下从消费能力、有效投融资、收入再分配、城乡间要素流动、外贸政策、科技攻关和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双循环 需求侧改革 三驾马车

2020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2020 年 12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随后 12 月 16-18 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的表述,内涵与“双循环”战略一脉相承,体现着进一步着力于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优化全局统筹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思维。内循环为主体,是强调倚托本土已经雄厚起来的统一市场,更多依靠中国自身市场潜力来形成经济发展中供需互动的主心骨。经济阶段转换、贸易战和疫情冲击“三重叠加”背景下,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到供给侧的优化管理与实施结构性改革,具有环环相扣的内在联系。新形势、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推进中,在突出重点、抓住主线的时候,还要有更高水平的整体性系统思维和全局统筹协调的更高水平——这是决策层面在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进一步提升了的战略思维框架。

一、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

(一)双循环提出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从 1978 年到 2017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 33.5 倍,年均增长 9.5%。与此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2010 年实现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使我国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我国经济增速也与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需要在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逐渐放缓过程中,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粗放式高速增长状态,完成一个增速下调,增长方式集约化的阶段转换。我国的这一过程表现为年度增速由 2010 年的 10.6%较快地于两年内下调到 2012 年的 8%以下,又于其后三年内相对缓慢下调到 2015 年的 7% 以下之后,从 2015 年下半年到 2018 年上半年长达 12 个季度的时期内,波动在 6.7%-6.9%之间。但 2018 年上半年美中贸易战开始,美国在外贸、科技、金融等多方面对中国遏制打压,使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降至 6%左右。而 2020 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更是使我国一季度经济增速大幅降至-6.8%,虽然之后几个季度经济有所恢复,但全年经济增幅应会表现为几十年未有的 2%或略高的低速。发展阶段转换、贸易战、疫情三重因素叠加形成的冲击下,还特别需要关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国际大环境复杂严峻,全球范围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抬头,逆全球化的种种表现更加明显。世贸组织预测 2020 年全球贸易将缩水 13%至 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将下降 3%。总之,三重因素叠加下中国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国内国际矛盾问题交织形成的、特别是由国际复杂局势引发的不确定性上升,基于的严峻复杂形势以及三重因素交互作用所可能呈现出的中长期特征,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将在巨大不确定性面前经受考验,这要求我们充分地注重把握好可选择的、应当正确把握的确定性,力求更多掌握主动权,继续推进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过程。作为有一定开放度的经济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就一向是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中央新近强调的“内循环为主体”,则正是当前时代背景下的新意所在,即有必要适当调整原本较高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将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侧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市场的供需循环,同时更好形成内、外双循环间的相互促进,从而进入更具有主动掌控权的高质量发展状态。

客观地看,我国已经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并成为制造业规模第一大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在工业体系方面,中国是全球当下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中包括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中类、666 个小类。在消费方面,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产阶层不断壮大,规模广阔的消费市场潜力还将不断释放,并且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还具相当可观成长空间的发展中阶段,更为注重开拓潜力巨大的本土市场,可顺理成章地增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回旋余地 and 应变能力,提升可持续发展中的主动权与掌控力。

中央关于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方针,正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的变化以及我国所面对的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所提出来的,体现了坚持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认识

不改变前提下,继续向前推进“新的两步走”现代化过程、并不断动态优化现代化战略策略系统化思维的最新精神。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中向更高层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

(二)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

自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形成巨大外部冲击和 2010 年我国提出“稳中求进”总基调以来,“扩大需求”的指导方针与相关内容已为各界耳熟能详。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明确确定要扩大内需;7 月 30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10 月 26 日开始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扩大内需的学理解释,就是激发、调动国内消费、投资的潜力而更有力地支持供需互动形成的经济循环,并且在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认识分析上,中央明确地形成了“供给侧结构问题是矛盾主要方面”的基本判断,通观全局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当下在扩大内需的基点又表述了需求侧改革和注重做好需求侧管理,决不是中央对此前提出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展思路的改变,而是体现了通盘考虑、寻求供需两端更加相互呼应和进一步优化相互协调关系的指导思想,以求实现供需两方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并没有改变,主要矛盾方面仍然体现在供给侧。但我们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上,着力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创新驱动依托制度安排和已有规则实施对于需求的调节,必然是对可通约的有支付能力购买力价值量化的总量调节,属于需求管理,而优化、变革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调控规则,属于需求侧改革,以需求侧改革(即优化与需求释放相关的制度安排)带动需求管理水平的提高,进而呼应和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整个结构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的主线,便合乎逻辑地成为“供给侧改革”这一表述的内涵。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同时,又需结合双循环中对于内循环为主体的侧重,积极考虑更为优化需求管理和配之以需求侧的改革,以更好为新发展格局中的高质量发展赋能。

(三)双循环视域下总供需的动态平衡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经济活动中供给与需求矛盾的两个方面持续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社会再生产的不断循环。虽然宏观经济学层面所追求的目标是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增长和总发展,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并不是总能达到均衡,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总供需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非均衡因素,政府合理作用的发挥,是着眼于使二者在总量和结构的不断调节和适应中,追求大体上的动态的优化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经济总量迅速扩大,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方面有很大增加的同时,双方互动的形式、特征也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传统体制下,经济通常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而上世纪 90 年代后,总体而言中国走出了短缺经济时代,不少方面产能过剩的特征在近年间愈益明显,针对这些年的供给端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大、债务高企、综合成本高企、结构失衡等问题,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即“三去一降一补”,以求化解供给质量偏低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又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在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需求侧的管理与相关改革。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可以在大框架上联系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中的生产和消费一头一尾两个环节。生产和消费都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生产决定着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另一方面,消费是生产等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生产的目的和原生动力,消费所形成的新的需求会对生产的调整与升级起到导向作用,激励现实的生产经营行为以回应最终消费的需求(以及相关的中间需求)。同时,就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已指明,古往今来,创新概念下的动力机制,需求侧实为“永新而无新”,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尤其在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信息革命时代,供给侧的创新更成为引领、满足需求,使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不断得到实现的关键动力源。因此,经济运行既要高度重视生产的供给端侧创新、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提高生产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消费与投资的需求侧,并总结调控经验弥补过于偏重需求侧总量调控的局限与不足,优化强化“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供给管理,使总供需在发展升级中不断寻求动态平衡。

二、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难点

以为中央提出需求侧改革的表述,是原来在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风向改变了,纯属误解(请参阅贾康《“风向”没变!应系统认识需求侧改革》,环球时报,2020 年 12 月 17 日)。中央是强调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的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体现的是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系统性思维,需要有各方统筹的全局观。需求侧改革所针对的,是为实现需求潜力释放而消除与制度因素有关的堵点,即优化以总量调节为基本特征的需求管理所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也自然地联通于管理调控运行机制上形成有效制度供给的创新改进。因此,打通堵点是需求侧改革的关键,需求侧改革也必将是与供给侧改革相互呼应、两相结合于配套改革系统工程之内的。传统思维框架下人们将需求在结构上划分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即所谓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这个认识框架已经对总量概念的需求做了结构化处理,这种做了结构化认识的需求,需要得到供给侧

的回应,供需两端互动起来,必然要求我们处理更为复杂的结构问题,这样才能实现对经济运行动力机制的全面认识与更深理解,消除需求侧的堵点,使需求进一步释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得益彰,让“扩大内需”与“双循环”的机制在配套改革中得到优化。

(一)消费的堵点

我国近些年消费贡献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又分量上升的表现,内需中消费的比重趋于突出。随着对疫情逐渐达到有效控制,经济逐步恢复常态化的增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更加注重高质量健康发展,消费将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打通消费堵点意义重大。具体考察分析,当下国内消费的堵点,主要有如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大,制约了公众总体的消费能力。

居民可支配收入即社会成员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购买力,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因为它是消费之源。目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城镇居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2013-2019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维持在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半以下,2/5 左右的水平(如表 1、图 1 所示),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也一直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一半以下(如表 2 所示)。2020 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年收入已达 3 万元人民币,但是仍有 6 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 1000 元出头,现在低保、失业保障、特困救助等人员大概一年 6000 万人左右,按原来的统计还有 500 多万贫困人口,但是又受到新冠疫情冲击,需要保障和救济的困难群众可能会更多。

表 1 2013-2019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和增幅

年份	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绝对数(元)	比上年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绝对数(元)	比上年增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绝对数(元)	比上年增长(%)
2013	18310.8	/	26467.0	/	9429.6	/
2014	20167.1	10.1	28843.9	9.0	10488.9	11.2
2015	21966.2	9.0	31194.8	8.2	11421.7	8.9
2016	23821.0	8.4	33616.2	7.8	12363.4	8.2
2017	25973.8	9.0	36396.2	8.3	13432.4	8.6
2018	28228.0	8.7	39250.8	7.8	14617.0	8.9
2019	30732.8	8.9	42358.8	8.0	16020.7	9.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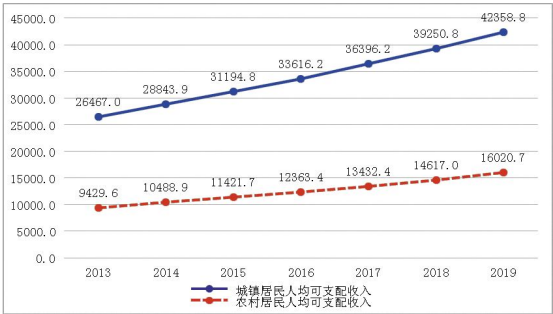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19 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 2 2013-2019 年人均消费支出

指 标	全国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元)	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元)	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元)	城镇居民消 费占比(%)	农村居民消 费占比(%)
2013	13220.4	18487.5	7485.1	71.2	28.8
2014	14491.4	19968.1	8382.6	70.4	29.6
2015	15712.4	21392.4	9222.6	69.9	30.1
2016	17110.7	23078.9	10129.8	69.5	30.5
2017	18322.1	24445.0	10954.5	69.0	31.0
2018	19853.1	26112.3	12124.3	68.3	31.7
2019	21558.9	28063.4	13327.7	67.8	32.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和居民人均收入量值有很大增加,但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逐渐增大。关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视角的“收入差距悬殊”问题,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以基尼系数的官方数据衡量(如图 2 所示),2008 年达到历史记录最高值的 0.491,以后虽逐渐走低,但 2016 年仍在 0.46 以上,按国际标准,属于过高状态;非官方研究群体对于中国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更是高于官方数值。经济增长虽然是减贫的根本,但收入差距过大却提高了贫困发生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我国形成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先天优势,但是对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的中低收入阶层乃至贫困阶层而言,空有增加消费的愿望,却不具备相应的消费能力,而且对可支配收入过低的贫困群体来说,尤其是在健康和教育等人力资本培育重要方面消费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不仅会影响现阶段的消费需求,也会在长期贫困循环中影响未来的消费需求。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过大,14 亿人中虽有合计 4 亿左右的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但有约 10 亿人是低收入者,占了总人口的 70%以上,这样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格局,与收入再分配“抽肥补瘦”制度机制建设不到位密切相关,严重制约了公众总体的消费水平,是消费需求的一个堵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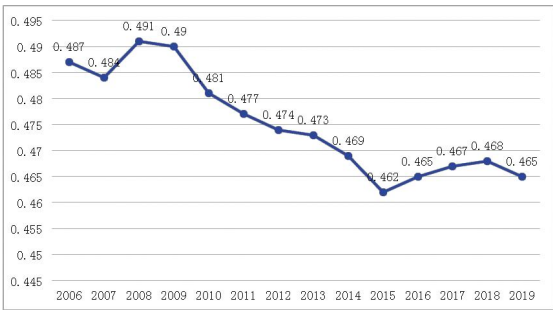


图 2 2006-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足,即虽有

学术顾问: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邓荣霖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维安 李新泰 刘诗白 刘 伟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王东京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国有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天勇 邹东涛

一定收入,但是有种种“后顾之忧”,引发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不敢消费。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已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相应增加,但是增加的消费量小于收入的增加量。“预防性储蓄”,则是居民储蓄激励的重要动力之一,即居民为了预防如失业、疾病治疗、子女教育费用等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会有意强化一定的储蓄行为,以防未来不时之需。居民对未来的顾虑越多,预防性储蓄倾向会更加明显,而相应的消费倾向就会更低。

对于现阶段我国消费水平来看,一方面从短期看,居民消费受到新冠疫情这个黑天鹅事件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居民有较多的后顾之忧也是居民消费倾向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严重爆发的 2020 年 1-4 月,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这一指标的同比增速严重下滑(如图 3 所示),疫情对社会消费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之后随着对疫情的控制逐渐取得了成效,复工复产逐渐展开,消费也逐步恢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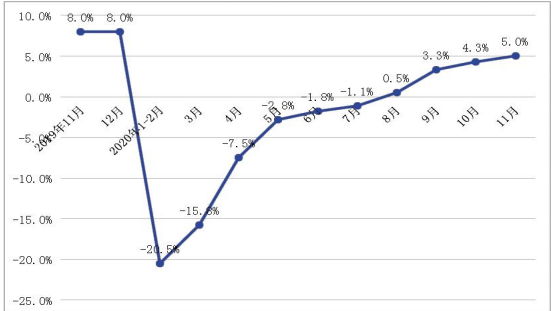


图 3 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综合从全年来看,疫情对社会消费造成的冲击不容忽视。据国家统计局分地区的统计,1-11 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04413 亿元,同比下降 4.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7002 亿元,下降 4.3%,城镇和农村的消费都因疫情明显受挫。目前新冠疫情已持续一年,成为笼罩全社会日常生活、消费中的一片阴霾,但在以“武汉解封”为标志基本控制疫情蔓延之后,城乡消费已在 2020 年 8 月转为同比正增长,10-11 月已分别增长 4%和 5%以上(见图 3 和表 3,环比数据见图 4)。

表 3 2020 年 1-11 月分地区消费品零售额规模和增幅

月 份	城镇消费品 零售额(亿元)	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亿元)	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同比增速(%)	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同比增速(%)
1-2 月	44881	7249	-20.7	-19.0
3 月	22974	3476	-15.9	-15.1
4 月	24558	3620	-7.5	-7.7
5 月	27881	4092	-2.8	-3.2
6 月	29052	4474	-2.0	-1.2
7 月	28025	4178	-1.1	-1.3
8 月	29273	4298	0.5	0.7
9 月	30200	5095	3.2	4.0
10 月	33498	5078	4.2	5.1
11 月	34072	5442	4.9	5.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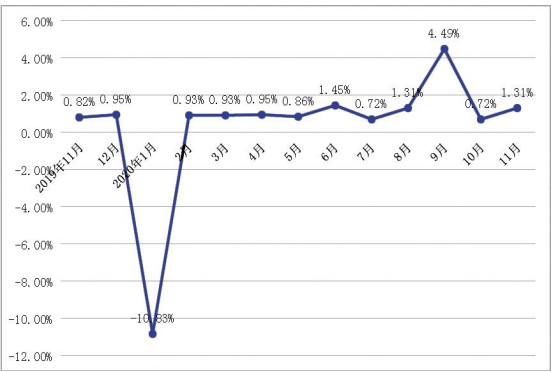


图 4 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估计 2021 年后,2020 年令我们措手不及的新冠疫情对社会整体消费水平造成的负面影响得到明显消除,是大概率事件,但消费需求不足将更突出地表现在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上。总体而言,需以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改进和健全,降低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倾向。疫情期间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当时中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超过 800 万人。如此规模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就业不稳定,享有的社会保障不完善,自然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消费需求的释放。而随着收入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会减少一般消费支出,因此释放有消费愿望但是因为后顾之忧而选择储蓄的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力,拥有较大的空间,也与相匹配的需求侧改革息息相关。此外,统筹基本养老金进一步发挥养老金蓄水池的共济互助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基本养老全国统筹迟迟不能落实为例,分散的“蓄水池”过多,其“互济”功能就受到很大局限。如果将其变为全国性蓄水池,

(紧转 A2 版)